

“三治融合”十年结缘

本报记者 江南

2013年,“三治融合”在桐乡基层萌芽,十年白驹过隙,这四个字已在各地生根开花,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。我们与它的结缘,便从那一年开始。

当年5月,桐乡市高桥镇率先在全国开展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“三治合一”试点,努力构建“大事一起干,好坏大家判,事事有人管”的社会治理新格局。很快,市委市政府出台《关于推进社会管理“德治、法治、自治”建设的实施意见》,一场变革全面铺开。

经过数个月的实践,桐乡的社会面貌由内而外发生变化——难以推进的高桥镇榨菜行业整治,经过“百姓议事会”的决议顺利提上日程;破解了7年的“地下旅馆”难题,随着“乌镇人家”民宿行业协会的成立迎刃而解……

很快,本报记者、时任《平安浙江》杂志执行主编梁萧,接到一项宣

传任务——借助我们报社的专业媒体力量,共同谋划和推广“三治”。

采访组应声而动,我和李洁前往桐乡,面对面采访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卢跃东,又挨个采访各部门一把手、蹲点镇村基层,最终形成《“三治”看桐乡·系列报道》,从不同角度深刻桐乡“三治”做法,反映建设成效。刊登后,创新理念惊艳全省,也引起省里的重视。

2014年,“三治”被纳入浙江省委工作要点及省平安考核。2015年,全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、提升社会风险防控能力现场推进会在桐乡召开,“三治”建设全面推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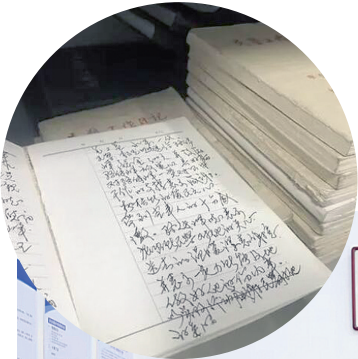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“百姓议事会”等治理载体已成为全市211个村(社区)的标配,一些村镇还打造出“民生议事厅”“木兰议事会”“五泾驿站”等品牌,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健全。

不断探索的路上,有收获的喜悦,也有踌躇不前的迷茫。这些年来,我们在做好宣传报道的同时,以媒体角度积极建言献策,并帮助整理

内参,将“三治”建设过程中的难点、思考及时传递省级层面。

多年的坚持换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—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”,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。这标志着,发源于桐乡的“三治融合”基层治理模式在全国推广。一位桐乡市委干部说,当听到“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”这句话出现在十九大报告中时,“全市的干部队伍都沸腾起来了。”

如今,桐乡不断丰富“三治融合”内涵。“乌镇管家”“云享乌镇”……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,桐乡用新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,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,构建起基层善治新格局。



150本笔记里的“枫景”



本报记者 陈佳妮

还是那一杯热茶,还是那句带着浓浓诸暨口音的“别着急”,不同的是,杨光照写下的“调解日记”,从

2018年记者第一次采访时的135本,变成了第150本,就像一个长篇纪录片,记录下许多人的生活经历,也记录下充满泥土味气息的“枫桥经验”的实践与探索。

当了24年枫桥派出所的民警,退休后,老杨还以人民调解员的身份继续天天“上班”,甚至组织上还成立了以他的名头来挂牌的调解中心。

2018年,老杨捧回“CCTV2018年度十大法治人物”的奖杯。记者第一次采访他,就是在位于枫桥派出所的“老杨调解中心”。老杨经手的案子,一件件讲下去,三天三夜也讲不完,全都浓缩在笔记本里。

打开铁皮柜,第一次翻阅那些泛黄的笔记本,我默默向他致敬——这些矛盾,没有一件是惊天动地的,可就在一两页的描述中,一杯热茶、一张笑脸,“一地鸡毛”就被他打扫干净了。

老杨更厉害的是,这些笔记本里的调解办法,“法”往往挺在最前面,法治精神在每处细节当中。老杨的办公桌上,放着一个放大镜和厚厚几本法律书籍,有新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出台,他都要好好学习、研究一番。

37年平凡的岁月里,在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的“枫桥经验”诞生地,老杨迎着变革的东风,一路奔跑。

从最初在田间地头调解,到2010年在派出所成立“老杨调解中心”,再到现如今搬去诸暨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工作。这小小的“变迁”,足以看出,“枫桥经验”是一个与时俱进、不断创新的过程,是一个由点及面、扩大覆盖的过程,是由“盆景”变为“风景”、聚“风景”为“全景”的过程。

12月1日,浙江飘起冬雪,早晨6点半,72岁的老杨又从家里出发了。7点40分,坐公交到达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,还没到上班时间,老杨就“上岗”了。

退休已经13年,为什么还是“5+2”天天上班?老杨笑笑,说既然在枫桥工作,就要有“奉献精神”。老杨总说,很有幸在枫桥待了这么多年,也很有幸能把自己的“青春”,全部献给“枫桥经验”。